

差別機會

與

犯罪副文化

譯

著

——黃維憲譯——

本文譯自 Society, Delinquency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Harnwin L. voss(ed), 1970,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中, Richard A. Cloward & Lloyd E. ohlin 著的 Differential opportunity & Delinquent Subcultures, pp. 248-255.

一、非法手段的可用性

社會規範是兩面性的，它包括着禁止的存在，但也隱含着另一方面的意義。例如主張誠實，一方面界定了某些行動是誠實的，另一方面則是宣告某些行動是非誠實的。換言之，規範界定了合法的策略，但也隱含着非法策略的界限。實際上，規範的目的，就是劃分合法和非法的 (legitimate & illegitimate) 界線。從行爲的分隔和分類的界線之設定中，使我們知覺到，那些是對的和正當的行爲，那些是錯的和不正當的行爲。因而至少從無言的文化規範而言，參與小偷和詐欺等犯罪行爲，可說不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因為備選手段 (alternative means) 的可能被利用，是早已被認知的。

雖然備選手段，有隱含於每一規範的傾向，同時也是廣泛地被認知；但是相反的一面，即它的觸礁情形，也常常會在犯罪理論中被發現。許多的犯罪學文獻，常常假設，一個人在解釋一種犯罪行動時，可能僅僅是說明個人如何去利用其文化中的非法備選手段，雖然從規範中，他老早已知道有其非法備選手段的存在。然而這種解釋，是十分令人不滿意的，因為對於不同的潛在犯罪問題，他們忽略了許多有關非法備選手段之相對可用性。一個人立志成爲醫生，並不足以解釋變成爲醫生的事實。在立志和成就之間，應該還有許多東西存在着。此種情形，正如一個人立志做個成功的犯罪者一樣，即使他不能使事件合法化，他也不會輕易地就選擇擺在其前面的一切相等之非法手段。在脫序理論 (Anomie theory) 中，假設接近合法手段是有不同的分配情形，一個人因爲其社會階級，可能喜歡某些便利 (advantages)，而拒絕普存於其階級結構的手法。舉例而言，不同階級的成員，暴露於促成向上流動的價值、知識和技藝等之下的程度是不同的，因而它假設社會結構的不同，在非法手段的可用性上亦不相同，應是不會令人吃驚的。然而要想瞭解此種假設和副文化的連接情形，我們首先應注意低階層中接近非法手段的不同情形。

很多社會學家已經想到接近非法手段有不同的通路，但很明顯的，他們却没有把此變數納入於偏差行爲理論中。此種現象，特別是出現於，

屬於芝加哥傳統的犯罪學家 (Chicago tradition of Criminology)。由此傳統所衍生的兩個相似的理論觀點，一個是由蕭氏和馬偕 (C. R. Shaw & H. D. McKay) 兩人所提出的文化傳遞 (Cultural transmission) 理論，它着重的是，有某些犯罪傳統的都市鄰里，如何在穩定的人口變遷中，持續地把犯罪傳統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另一個是蘇壽南 (E. H. Sutherland) 的差別結合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它強調犯罪行為是學習而來的。此種學習是由與已具有犯罪價值的別人互動而得。因而第一個理論強調的是，不同地區的價值系統，而第二個理論強調的則為社會關係系統如何促進和阻礙那些價值的獲得。

在芝加哥傳統中，那些著重於學習成為犯罪者所牽涉到的過程之學者，實際上已指出非法手段可用性的不同，雖然在他們的分析中，不會明顯地認知此變數。此種情形的最佳例子，最好是回頭看看蘇壽南的典型著作：職業竊盜 (The Professional Thief) 一書。依照蘇壽南的意見，竊盜嗜好因素，並不能充分地解釋職業竊盜的發生原因。自製竊盜 (self-made thief) 是缺乏從控訴中獲得免疫 (immunity) 和相似的防衛技術的方法之知識，因此他很快地將身繫監獄。……一個人所謂的職業竊盜，在其成為職業竊盜前，是要為其他職業竊盜所認知和承認。但是認知的給與，並不是簡單的，因為在被認知為職業竊盜的過程中，實際上包括著選擇和指導 (selection & tutelage) 兩個必要要素。……一個人除非能從眾人口中超越羣而

出，且被職業竊盜所選中，否則他不可能被認知的。因為他必須受到職業竊盜的重視，故他必須具備機警、厚顏、談吐能力、忠誠、可信任、沉着和果斷等特質。再者，此候選人是為高度扮演所決定，因而只有少數人才能在此生涯過程中達到此地步。然而此種偏差的動機和壓力，並不能充分地說明偏差行為正如從眾的動機和壓力，也不能充分地解釋從眾行為為一樣。因為一個人的行為之養成，決定於下列兩個因素，一是必須能接近其學習環境；第二是，一旦被訓練後，也必須有扮演此角色的機會。然而不論其為偏差或從眾角色，並不是能自由得到的，同時如何接近它們，也是決定於很多的因素，如一個人的社經地位、年齡、性別、民族親和力 (ethnic affiliation)、人格和其他等。從而，潛在竊盜就像醫生一樣，他們發現要接近目標，是要受到許多的標準所支配，並不是僅僅具有特長和動機兩者就可以了。

我們的假設是，接近非法角色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隨意達到的。只有在那些犯罪很盛，而且已成為制度化的鄰里地區，才是年輕人學習犯罪的肥沃園地。因為在那些環境中，才具有不同年齡層的罪犯之整合形勢；因而被選出的青年，能被適當地安排於不同的結合中；並從其中獲得成人的指導，也得到犯罪的價值和技巧。然而如只有此種角色準備，並不能擔保一個人將會完全地履行此角色。而不能履行此角色的最重要限制，乃在於被添補入此不同結合模式的年輕人，是超過於成人罪犯結構所能吸收的數量。因而對於那些精華位置 (

elite position) 的競爭就很激烈，於是選擇的標準和機械 (mechanisms) 也就產生了。從而有一部分候選人，並不能因其已有準備，而被允許參加那些行為。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接近非法角色和接近合法角色是一樣的，兩者都受到社會和心理的因素所限制。是故，在下文中，我們最先要討論的是，非法機會中的社會結構的歧異情形。我們認為此歧異情況，與犯罪副文化類型的發展，有着很大的關係。

二、學習和扮演結構

我們使用的合法或非法機會兩名詞，實含有接此兩者的學習和扮演結構。也就是說，一個人如要扮演某一特殊角色，則必須接近此特殊角色的正確環境，才能得到其價值和技巧；同時一當他學習了上述事件後，也要有被支持去扮演此角色的機會。

特南波 (Tannenbaum) 在數十年前，已清楚地說出，犯罪角色扮演，無殊於傳統角色的扮演，在其中已鋪設有預先準備的關係模式組，實習者由其中學習到必需的價值和技巧，也從其中得到鼓舞。他說：「造就一個好的罪犯，是需要有很長時間的特殊訓練和準備，但是其對人的訓練，則是有選擇的。人們是在存有物質和知識的社區進行學習；同時一種技巧的學習，更需要滲透有目的和希望學習環境。然而社區所提供的態度、觀點、人生哲學、範例、動機、契約、友誼和誘因等，都不

是孩童天生俱有的，而是他們發現它存在於那裏，可加以使用和精緻。社區給與犯罪者的物質和習性，正如社區給與醫生、律師、教師和燭臺製造的一樣。」

蘇壽南系統化此一般觀點，認為至少在機會上包括有學習結構在內，因而犯罪行為是學習的，再者它是從與他人互動的溝通中學到的。然而他也承認差別結合理論，並不能充分地解釋犯罪行為。在一九四四年流行的一篇論文中，他承認，犯罪行為部分地可能是機會功能（例如扮演），才發生犯某種特殊類型的犯罪，例如挪用公款、銀行竊盜、不法性關係等。因此，機會可能部分地是犯罪模式結合的功能，也可能部分地是獲得那些特別技術的功能，它並不是全部決定於其態度，因而差別結合，並不是犯罪行為的充分原因。

從而，就蘇壽南而言，非法機會包括對於犯罪角色的喜愛條件，以及喜愛此種角色（差別結合）的條件。我們建議，那些條件是由產生犯罪的社區之某些社會結構形態來決定。

三、差別機會的假設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在合法和非法的機會結構中，都據有一個位置，這是一種界定情境的方式。脫序理論視一個人的主要依據是合法的社會結構。它着重的是合法社會結構所引起的有關達成成功目標的合法途徑之不同的問題；同時它假定接近非法通道是自由可行的，但此可行性之差別，是很少具

有意義。此種趨向，可從下列墨頓(Merton)的陳述中看到：

某些研究者，曾經表示出，某些特別地區的罪惡和犯罪，可視為是一種情境的正常反應，即着重於金錢成功的文化，已經吸收了它；但是在那裏，却只有少數能接近一般和合法成功的手段之機會。在那些地區的人們，大部分是屬於手工的勞工，少數則為白領職業。從英國手工勞工的烙印中，使得全社會階級都出現了統一的形式，同時又因缺乏超越水準的現實機會，以致於他們得到有偏差行為傾向的標幟。未熟練技術勞工的地位和其後續的低所得，是不能與有組織的罪惡，不正當獲利者和罪犯的依據顯著財富水準，和有權力的希望和高所得者相抗衡。……此種情境導致了對於合法性的稀釋(attenuation)，雖然奮鬥和提高非法性的使用，是全盤地無效，但多多少少却引人注意和便利的。

在另一方面，文化傳遞理論和差別結合理論則假定，接近非法手段是可行的，但他們不會認知它與合法手段的不同之比較，有何種意義存在。蘇壽南在其差別結合理論的九個命題中曾說：「雖然犯罪行為為一般需要和價值的表白，但它不能依那些一般需要和價值來解釋，因為非犯罪行為，也是相同的需要和價值的表示。例如竊盜一般是以偷竊取得金錢，它與誠實的人，以工作取得金錢的需要是一樣的。許多學者企圖從一般驅力和價值，如快樂原則、社會地位的奮鬥、金錢動機和挫折等，來解釋犯罪行為，將是徒勞無益的，因為它們對於合法行為和犯罪行為的解釋，將完全一樣。」

在此陳述中，蘇壽南似乎假定，如不論其社會位置，人們接近合法手段的機會，是公平和自由的。但是，至少他不曾視接近合法手段為一個變數。當然，以社會地位的奮鬥、金錢動機和其他社會讀許等驅力因素，也不能充分地解釋偏差和從眾行為也是真的。但是如果目標定向行為(goal-oriented behavior)，在用合法手段以滿足上述驅力時，受到了社會地結構的干擾，則我們預期，所造成的壓力，將會導致偏差。

差別機會結構概念，允許我們把認知於接近合法手段的不同的概念之脫序理論，和隱含接近非法手段的不同的概念之芝加哥傳統，合而為一。現在我們可以注意於個人，不僅注意其個人所屬系統以及此系統與其他系統的關係，同時也注意於合法和非法兩個系統。舉例而言，此取向允許我們去詢問，相對於非法機會的可行性，如何影響導致偏差行為的調適問題之解決。我們相信，那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可能是決定於一般社會結構中，因重點不同而產生對於不同非法活動的不同支持所致。假如在某一社會地區(social location)中，非法和犯罪手段不是容易地可被使用時，那麼將不會期望在其中的青年會有犯罪副文化產生。同樣的邏輯僅有在犯罪手段不被青年所否認的地區，我們才可以期望，用操縱暴力以達到高地位為主要的接近方法將會出現。第三種例子是，參與藥物欺騙和以藥物消費為中心的副文化。吾人預料，它們的產生，必須是以能獲得藥物，以及有如何使用它們的知識為必要條件，此狀況在某些地方可能很困難，

而在其他地區，可能很容易。簡言之，不同的社會結構，呈現出不同的非法適應類型。此種不同的非法適應類型，對於因受合法手段的有限可行性影響，而尋求解決調適問題的人，提供了可行性，因而從此意義而言，我們可說，一個人是生存於合法和非法兩個機會結構裏。假如接近合法手段，以達成成功目標的通路是有限的；那麼犯罪反應的本質，將會以不同的可行之非法手段，來做為達成成功目標的手段。

四、犯罪副文化的變異

在大都市中心的低階層地區中，男青少年似乎都會遭遇到下列三種典型的犯罪副文化。第一種犯罪副文化，主要是植基於犯罪價值。其成員是以強奪、欺詐或偷竊等行為為手段，而以追求物質收穫為其目的而組成。另一犯罪副文化，則以暴力為重點，其成員希望能透過「力」，或「力」的威脅的操縱，而取得浪子地位。他們是對於壓力（press）很注意和有興趣的戰士團體（warrior group）。第三種副文化，則着重於藥物的消費，參與此副文化的人，已經與傳統角色的扮演疏離，如他們在家庭裏或職業世界中所獲得的角色。他們已經退縮在歸隱世界中，在此世界中，他們的最終價值是快感（kick）。上述三種副文化形式，我們分別稱之為犯罪（criminal）、衝突（conflict）和逃避者（retreatist）副文化。

從優勢社會秩序（dominant social order）的

觀點而言，此類濃縮的名詞，僅是表示出，每一個形式的主要適應定向（principle orientation）是什麼。雖然我們可能發現，許多副文化例子，可以適合上述三種副文化類型，但是我們常常也會發現，它們是以混合的形式出現。例如以衝突副文化為主導的成員，有時也會參加有系統的竊盜；以犯罪副文化為主的成員，有時也會在街頭上和其他敵對的幫會發生戰鬥。但是此種例子，不應該抹煞了個別副文化間，持有個別不同的重要定向表現之事實。

犯罪副文化的組織，和對於參與者的忠貞之控制幅度，是隨成員的不同而不同。某些幫會成員，幾乎全部沉浸於副文化的觀點，副文化支配着他們所有的接觸，其他的幫會，則可能把他們的生活，與家庭、學校和教堂等角色分開。然而，一個年輕人在長時期中，能够成功地分開犯法和從眾角色的機會，是很少的。從副文化所發出的壓力，常會導致其成員，對於從俗世界中的父母、教師、警察和其他成年人，採取不友善的態度。一當他對犯法行動有所瞭解後，他以間隔化角色扮演，來維持犯罪機會的可能，就喪失了，他面臨到必須在守法和犯法兩個生活型態中，擇一的情境。因為家庭、福利、宗教、教育、法律執行和矯正等制度，是與犯罪結合相對立的。此種情境是狼狽的，因為它牽涉到一種對一方或其義務系統的全部接受或拒絕。

然而在任何時間點上，控制行為的犯罪副文化，也會因成員的不同而不同。因而對於上述副文化的描述，則必須以那些死硬的成員為標準，而不是

以一般成員為依據，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把不同的犯罪生活型式，區分清楚。基於上述的瞭解，我們依據經驗特質，摘要地列出下列三種主要的犯罪副文化。

（一）犯罪的類型

在社會學文獻中，此種犯罪模式，在低階層文化裏，是佔有最廣泛的證據。它常被描述為，是整合青少年偏差和成人犯罪的傳統。在參與此傳統中的青少年，其中心價值定向是，犯罪行為只是達到成功目標的一種手段。其內團體（in-group）的支配標準之評價，完全在於成就及如何使用技術和知識，以達到成功的結果。在此副文化中，聲望是分派給那些透過被大社會所界定為非法手段，而能有物質和權力獲得者。從年輕者到年老，成功的意外橫財（haul）——很快地從赤貧成為有錢者——是可能和所慾的一個永久禮物（ever-present）的想法。雖然一個人可能經過偷竊或搶劫的路途而達到物質成功，但破記錄（big score）仍然是快速成功的象徵影像（symbolic image）。

犯罪副文化成員，用以達到成功的手段，是為志願者所清楚地界定了。他學習去讚美和尊重老年罪犯，並正確地選擇一個傢伙（right guy）為其角色模式的學習對象。犯罪插曲（delinquent episodes）幫助他去達成技巧的熟練和得到犯罪世界的定向，也幫助他瞭解在犯罪事業（criminal enterprises）中，如何與其他罪犯成功地合作。他表現出對於大社會的代理者的仇視和不信任態

度。他視傳統世界的成員為吸血者 (sucker)，當有可能時，他自然地會被他們利用為犧牲品。他視傳統世界中的成功者為騙子 (racket)，例如大商人是浪費者，政客則為收受賄賂者。此種態度，成功地中性化 (neutralize) 了傳統規範的控制效果。為了與內團體內的正確傢伙，維持忠貞、誠實和確信的關係，在他與犯罪結合的接觸中，他必須向犯罪結合證明，他自己是可靠的和可信賴的，然而他對於外國體 (out-group) 的非犯罪者，則沒有此義務。

在犯罪世界裏，保證成功的最佳路線，是織成適當的網絡 (connections)。當為年輕罪犯時，其手段就是追隨包含有其他正確傢伙的團體，並使自已升級為學徒關係，或與其他年老而成功的罪犯，形成良好的關係。同時與車輪小販、收贖者和產生所得的局外人等，結成可靠和可信賴的結 (tie)，更是特別的有用。再者，在犯罪生活中，他們也藉着對於傳統社會中，許多公務員的私人道德的偏見觀點，而給予青少年犯的鼓勵和保護。一當長大後，他便與由貪婪的保釋人、陰影律師 (shady lawyers)、貪污警察、政客、詐欺商人和瀆職監獄官等所形成的世界，非常地熟悉。從而藉着與這些半合法、半非法角色的佔有者，與黑社會的重要人物 (big-shots) 的接觸，野心的罪犯確認和肯定

其犯罪行為，在此世界中是可來去自如的和非常安全的。

(I) 衝突的類型

低階層文化中的衝突類型之角色模式，是打擊手 (bopper)。他高視闊步於幫會內，用武器打架而受到其他幫會成員的多方面尊重。成人世界的成員，因其對於人們或財產的不能預料和侵略性的破壞本質，也不得不對其帶着恐懼性地順從。然而從其他幫會而言，打擊手的資格，是屬於那些長勝的戰士。他的扮演必須表現出，他願意為了他的個人正直 (his personal integrity) 和幫會的榮譽而戰。他必須勇於做上述事件，同時在遇到個人危險時，也要表現出無畏的精神。

打架幫會世界的第一目標，在於獲得「強大」和「破壞性」的暴力榮譽。一個具有浪子 (rep) 頭銜的人，不僅擁有來自幫會成員和恐懼成人兩方面的尊重，同時在強壯體質和其象徵的肌肉上，也受到讚美。他代表的是，在受剝奪地區中，為了接近青少年的歡樂和機會等稀少資源的一種方式。

總之上述所述的一切，說明了打擊手的影像，在浪子心目中是最有價值的，即使他在面對超級力量時，他也不能退却。同時在碰到有對其個人無禮，或對其幫會的忠貞的挑戰時，他是不能怠忽而不

出場的。浪子的典範，可說是一個強調勇氣、保護其團體以及維護榮譽的戰士。

打架幫會成員與成人世界的關係是嚴格地被稀釋了。打擊手最常描述其與成人間的關係的名詞，是「淡淡的」(weak)。他無法發現，達到成人成功的機會結構時，他所須扮演的角色模式。他視自己是孤立的，並且對成人世界感到冷淡。成人的犯罪，是成人的興趣，與他無關。他們用以解釋他們所以要有不同的行為之理由，是脆弱的，就如他們努力幫助打擊手時，打擊手對他們的幫助之解釋，是一樣的。在碰到成人世界的顯著冷淡和虛偽時，典型打擊手常希望能對他所缺乏的注意和機會，旋以威壓而得到勝利，否則他對此事便失去興趣。最近幾年來，街坊幫會工作者 (street-gang worker) 依其本位主義 (On its own turf) 所做的討論，不僅已藉着成人世界中的幫會之無法無天的認知，而且也對前述機會的讓步之否認而象徵化了打架幫會。打架幫會透過幫會競爭的鍊金術 (alchemy)，藉着成人世界對於的注意姿態，而轉變成為威望的標幟，從而在打架幫會中，暴力的操作，從冷淡轉變為適應，從注意轉變為地位。

(II) 逃避者類型

逃避主義 (retreatism)，可包括個人地或團

體地表情的 (expressive)、官能的 (Sensual) 或無上的 (Consummatory) 經驗等變異。而在此文的分析，我們只興趣於上述經驗中，有藉用藥物或得到副文化支持的經驗。我們採用這種限制的用法，仍是維持我們以副文化形成 (Subcultural formation) 為重點的考慮。此種副文化形成，很清楚地，是被認為是違法的，就如青少年的藥物使用，是被認為是違法的一樣。用表現的經驗之逃避者，雖然在低階層青少年中，產生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嬉皮儀式，培育了偏差模式，但它並不一定具有違法行為。

在低階層地區的副文化藥物使用者，知覺自己，與傳統世界裏的成員之生活型式和日常生活，在社會和文化上是分離的。下文是引自懷恩史東 (Finestone)，在芝加哥黑人低階層區域，所觀察到的「醉貓」文化 (Cat culture) 特質。它描述的為，嬉皮主義中藥物使用的一般性內涵。因它並不足以代表其他地區的藥物文化之所有層面。然而我們之所以以懷恩史東的觀察所得為基礎，乃因為它們提供了此社會中可用的最佳描述，而低階層青少年藥物副文化，即由此而產生。

醉貓逃避者副文化的支配性形態，在於快感的持續追求。每一隻醉貓都有其快感類型，如酒精、馬尼瓦那 (marinana)、藥物耽溺、熱門音樂和

不尋常性經驗等的單獨或結合形式。不論其形式內涵為何，快感就是一種恍惚經驗的追求。逃避者的努力，在於追尋「生活的深度知覺」 (intense awareness of living)，和「不屬此世界」 (Out of this world) 的快樂意識。一個人被認為，是居於快感高潮時的極端形式，則為追求最高的精神和神秘的知識 (almost spiritual & mystical knowledge)。過去和將來凝聚於醉貓的現在時間流中，因而現世經驗的徹底知覺，可說是快感的真髓。

成功的醉貓，有一連串賺錢的急遽活動 (a lucrative hustle)。這些活動，與傳統社會中，常規職業必受的訓練和規則，正好相反。這些活動的特徵是，對於暴力和勢力的拒絕，對於想取得快感經驗的外人，使用操縱、瞞騙和欺詐的手段。醉貓也乞求、借用、偷竊，或參與某些小而可憐的騙局 (petty con-game)。他藉着走方郎中 (peddling drugs) 或龜公的工作，而迎合他人的非法渴望。對於婦人的高度剝削態度，使得醉貓視龜公為一種榮譽的所得來源。透過在妓院和順手牽羊中的小角色工作的扮演，他能遊手好閒地生活。同時他把其全部精神，投注於與快感的美學快樂有關的組織、安排和經驗等之中。在快感中醉貓的急遽活動，則已退成為其次要的興趣。從此意義而言，醉貓與

其他副文化成員的不同，在於其他副文化成員的主要考慮，是所得生產 (income-producing) 活動。

標準醉貓的外表、品格和嗜好，可以厚顏 (cool) 為其最好的寫照。醉貓在服飾嗜好上，是高度的發展和複雜。在其行為裏，他企圖透露其自信的 and 沉着的態度 (self-assured & unruffled manner)，因而對於強壯者而言，他們則着重於超然冷淡 (aloofness) 和超人一等 (superiority) 等表現方式。他發展出富於色彩、和有歧視 (discriminating) 的字彙，並儀式化其姿態，以表現出，他有與傳統世界不同的意識，以及他與逃避者副文化的連帶關係。

厚顏此字彙亦可做為，逃避者與傳統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分離和超然意識的經驗。他的參考團體，是醉貓社會，亦即使他變成獨立於傳統世界的「精英團體」 (elite group)，在此團體中，一個新目標的秩序和成就標準，被創造出來了。醉貓亦不把其價值系統，強派給強壯者。相反的，他們藉着快感的培養和急遽的活動，在醉貓社會中，為其地位和順從而努力。從而，逃避者副文化，提供了接近成功目標、社會榮譽、福利或統一性的意識之通路；否則其成員所感到的世界是超出於其能力的。